

一九五一年五月

新民主主義論補充參考資料

南昌大學政治課教學委員會編印

目錄

學習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	胡華(一)
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	華崗(二五)
誰領導了「五四」運動和第一次大革命·····	胡華(三)
誰領導了抗戰·····	胡華(三)
人民民主建政·····	謝覺哉(六一)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	宜鄉(七五)
加強人民的革命專政·····	吳江(八七)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馬寅初(九五)
新民主主義的國營經濟·····	沈志遠(一〇五)
新民主主義的合作經濟·····	狄超白(一二三)
過渡期的個體經濟·····	狄超白(一二〇)
新民主主義經濟下的民族資本案·····	千家駒(二七)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曾慶舜(二四)
新中國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	何幹之(二八)
認識美帝文化侵略的本質·····	方直(一四)

學習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

胡 華

世界革命的導師，輝煌的馬列主義理論家斯大林同志，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就已經樹立了正確的學說。斯大林同志的學說，經過中國人民二十多年的革命鬥爭的實踐，已完全證明是中國人民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確道路。

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國共產黨主義者，二十多年以來，虛心地向斯大林同志的學說學習，把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指導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達到今天的偉大勝利。毛澤東同志所作的關於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與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我們在斯大林同志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中，已可找到端倪。所以，劉少奇同志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曾說過：列寧——斯大林主義是指導了與正在指導着世界人民去獲得解放，而作爲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生的毛澤東的思想，乃是發展着與完善着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而不論在蘇聯或中國，一切違反列寧——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各派機會主義思想——孟什維克主義、托洛斯基主義、半托洛斯基主義等等，都經不起實踐鬥爭的考驗，都被證明爲澈頭澈尾的錯誤。

本篇的目的，是把斯大林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作一較有系統的介紹，以供學習陳伯達同志論文「斯大林與中國革命」時的參考。本篇所引斯大林同志原文，是根據他的下列六篇歷史文

獻：

- 一、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分委會的演講）
 - 二、中國革命問題（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聯共中央所批准的給宣傳員的提綱）
 - 三、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 四、中國革命和共產黨國際的任務，（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屆全會第十次會議上的演講）
 - 五、關於中國（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真理報」發表「略談現代題材」一文的後半段）
 - 六、關於中國（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聯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委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以上六篇均見時代出版社出版，付之譯：「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問題」第一至一七六頁）
- 爲了便利，文中在引用斯大林上述著作的時候，就只在引文下按照上述排列註明（一）（二）（三）等數字。文中的着重點都是我加的。

一、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兩大潮流的匯合，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正確的認識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國情，是確定這個國家的革命性質、引導這個國家的革

命走向勝利的基本前提條件。近代中國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呢？斯大林指出中國社會性質的第一個特徵是：「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國主義財政經濟的統治。」（二）斯大林說：

「中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不僅表現在它的軍事的強大上，而是首先表現在：中國工業的基本綫索，鐵路、工廠、礦山、銀行以及其他等等都是處在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支配之下或是革命監督之下的。」（一）「中國社會性質的第二個特徵，他指出是：『被軍閥統治和官僚政治的壓迫所加重的封建殘餘的壓迫。』」（二）「中國社會性質的第三個特徵，他指出是：『被軍閥統治和官僚政治的壓迫所加重的封建殘餘的壓迫。』」（三）「中國社會性質的第四個特徵，他指出是：『被軍閥統治和官僚政治的壓迫所加重的封建殘餘的壓迫。』」（四）

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兩大潮流的匯合

既然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國革命運動的巨流——反對封建殘餘的運動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的匯合。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反對封建殘餘的鬥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

的結合。」（四）

在這兩大任務中，首先重要的是反帝，因為帝國主義是國內封建勢力的支持者。斯大林說，中國革命首先是一把自己的尖頭針對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的。」（四）當然，反帝和反封建不能分離，不能偏廢一面，所以斯大林說：反對封建殘餘的農民革命「是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之一。」（三）

對於官僚資本主義，雖然在二十多年以前斯大林同志寫上述幾篇文章的時代，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主義集團還沒有形成，但是，在當時，斯大林同志已經指出了：買賣資產階級一貫是中國革命「不共戴天」的敵人。而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舉行「四一二」政變叛賣革命以後，斯大林同志更指出「南京和南京政府是民族反革命中心」（四），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投降帝國主義的大資產階級作鬥爭。

毛澤東和圍繞在毛澤東周圍的中國布爾什維克，在北伐革命時期以及北伐革命失敗以後，和斯大林同志一致，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社會「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與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中國革命「確實還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見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贛邊黨二次代表大會決議」），因而正確地領導了革命。

在中國北伐革命時期，當時還隱藏在蘇聯共產黨內的反革命分子拉迪克等，認為在中國社會統治着的經濟形態是「商業資本主義」，認為中國革命、中國農民階級的鬥爭是「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托洛斯基等反革命派，既不承認中國有封建殘餘，也抹殺了中國革命的反帝任務，而認為中國革命只是「要求關稅自主的革命」，這種胡說，正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張作霖、蔣介石輩

，和大資產階級所歡迎的。在北伐革命失敗之後，托洛斯基派就和中國的陳獨秀取消主義者相呼應，認為國民黨反動派買辦豪紳的統治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認為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佔優勢的社會，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而在等待將來舉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幌子下，主張取消革命運動。這些反革命的辯護士，都經不住中國社會中國革命的活的事實的考驗和斯大林、毛澤東的理論的駁斥，而宣告了自己的破產。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斯大林同志說：

「列寧是正確的，他說，從前，在世界革命時代未到之前，假使民族解放運動是一般民主解放運動的一部分，那末現在，在蘇維埃革命在俄國勝利之後，以及世界革命時代來到之後，民主解放運動就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了。」（一）

和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合起來，這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所必需的。斯大林同志說：「要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家內達到堅固的勝利，非把這些國家的解放運動與西方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切實聯合起來不可。」（斯大林選集卷一，一九二五年五月「論東方大舉對東方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任務」）。中國革命勝利特別有一個有利條件，這就是「蘇聯依靠在中國近隣存在着和發展着，它的經驗和幫助，便利了中國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以及中國的封建和中世紀殘餘的鬥爭」。（一）

正因為中國革命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因為中國是一個擁有四萬萬五

千萬人口的偉大國家，所以斯大林充分估計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重大世界意義，並寄予了熱烈的期望。他在二十三年以前——一九二七年五月就作了如此熱情的預言：

「在中國，對帝國主義鬥爭一定採取深入人民的和顯明民族的性質，並且一定會一步步深入，直到和帝國主義拼死搏鬥的境地，震撼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基礎。」（三）

二、中國革命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統一戰線的革命

中國革命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應該是無產階級。——這是一個思想，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是反覆宣傳的。這首先是因為無產階級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中最堅決、最勇敢、最徹底、最不自私的階級。斯大林同志曾說過，中國工人的生活是最痛苦的，「現在中國的工人每個月只拿八塊到十五塊錢，生活在不可能的條件之下，工作時間非常之多。」（四）斯大林同志認為，應該充分着重認識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和意義。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說：

「我以為，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首先依靠無產階級來確定自己的方向。」必須「在中國無產者中間喚起一種自信有力量的感覺和自覺有資格的感覺，並且造成他們能够領導革命運動。做不到這一點，就少想中國革命的勝利。」（一）

他在那時，就估計到：「中國革命的發起者和領導者的角色，中國農民階級領袖的角色，應該仍然地落到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手中」（一）。他提出這個問題，是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到極低程度的」這一點聯系起來說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不能主導的領導中國反帝封建革命走向勝利的。因此，中國無產階級必須「強固自己的指導權，領導城鄉千百萬的勞動者羣衆。」（二）因此，「在發展着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積極性，它在千百萬勞動羣衆中威信的提高」，是確定中國革命性質的基本問題之一。

必須組成全民族的統一戰線

因此，無產階級必須主動的團結一切遭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壓迫的其他階級、黨派、團體和個人，組成強大的全民族的統一戰線，以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進行勝利的鬥爭。這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問題。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關於無產階級的同盟者的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之一」（五），「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必須利用最微細的可能，來保障無產階級有人數衆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暫時的、搖擺的、不牢固的、不可靠的。」（五）

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國一九二四——二七年的革命的特徵之一，在於：「它曾是全民族統一戰線的革命」（六），而在中國「全民族的聯合戰線的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階級，是城市貧民，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民族資產階級」（五）。所以，中國革命，應該是「無產階級和積極地爲自己的利益而起來鬥爭的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結成聯合」（三）的統一戰線的革命。

在中國一九二四——二七年的革命「初期和中期，即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前，當時的有共產黨參加的革命的國民黨，就會是當時中國革命的四個朋友相聯合的組織形式。斯大林同志曾說過：「在國民黨還沒有發生分裂的時候（按：指「四一二」以前），國民黨在事實上是工人、小資產階級（城市的與鄉村的）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三）斯大林同志認為，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積極參加這個聯合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由於「這些同盟者並不是也不會是同樣可靠的」（五），所以，必須十分注意「要保障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黨內以及在國民黨外的領導作用」（四）。斯大林這樣地指出統一戰綫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意義：

「統一戰綫，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和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就是它不妨害共產黨去進行自己獨立的政治的和組織的工作，把無產階級組織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喚起農民反對地主，公開地組織工農的革命，以準備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條件時，才有革命的意義。」（六）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時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直接違反斯大林同志上述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放棄無產階級在民族統一戰綫中的領導權，對資產階級只講聯合不講鬥爭，到這次革命後期，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發展成為階級投降主義，成為當時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日戰爭初期，又曾一度發生了這種與陳獨秀階級投降主義相類似的、相信國民黨超過相信羣衆的錯誤思想，但是受到了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及時糾正。

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些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則是違反了斯大林同志的儘量爭取組成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綫的思想，未能利用形勢及時正確的組織反帝統一戰綫，而錯誤地主張一切打倒，實際上正是孤立了自己。

毛澤東同志早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對於北伐革命時期在統一戰綫中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上陳獨秀主義的錯誤，就作了如下的歷史總結：

「從廣東出發向長江發展的一九二六年的革命，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堅決地執行它的領導權，被買辦豪紳階級奪取了領導，遂改變了革命的性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遭遇歷史的失敗……」

而對當時的今後革命則指出：

「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是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

對於十年內戰時期的中國政治情況，則指出：

「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以上均見湘贛邊二代大會決議）。

因此，組成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綫的基礎是仍然存在的。

這些論點，都是和斯大林同志相一致的。

必須以工農聯盟為基礎

為了使革命統一戰綫有堅實的基礎，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去聯合農民，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馬列主義的關於工農聯盟的思想，斯大林同志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書中，以及在列寧逝世時向列寧宣讀的誓詞中，都有光輝的發揮。在中國問題上，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所發表的論中國的文章中，這個問題也是其中的很重要的內容之一。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同志在一九

二七年二月所寫的中國革命理論的輝煌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與斯大林同志也是一致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半封建落後的中國，農民在全部人口中佔絕大多數：「中國約有四萬萬人口。其中約有三萬萬五千萬人是漢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農民。」（一）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就指給我們：農民是中國反帝戰綫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的最主要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軍。他時常說：「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問題在實質上是農民問題」，「農民革命的勝利，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他指出：認為發動農民起來就會破壞反帝的統一戰線的思想是錯誤的。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說：

「我知道，在國民黨人中，甚至於在中國共產黨人中，有些人並不認為可能在農村中展開革命，他們怕農民階級的拖進革命，會破壞統一的反帝戰綫。這是極深重的誤解。同志們，把中國農民階級愈是迅速和愈是基本地拖進革命，中國的反帝戰綫也就愈加有力和愈加強大。」（一）

的確，農民問題是左右中國革命全局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也說：「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乃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而農民起來革命，「打翻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

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正是拿反「帝國主義」作為反對農村革命的藉口，害怕農民革命的發展會使資產階級因不滿意而退出反帝統一戰綫，因而一再壓制農民運動。結果却是加速了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使帝國主義、買辦豪紳階級獲得「勝利」。歷史證明：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路綫，是引導

革命走向勝利的路線，而陳獨秀輩的路線則是引導革命走向失敗的路線。反革命的辯護士托洛斯基，從否認中國有封建殘餘出發，而否認與低估中國農民革命的意義，更不用說是直接爲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張目了。

斯大林同志認爲：「爲了召喚千百萬的中國農民階級起來革命」（一），爲了鞏固工農聯盟，中國無產階級可以通過三條道路去實現對於農民的領導，就是：一，通過建立農民委員會，二，通過新的人民革命政權的機構，三，通過革命的軍隊。他說明：農民委員會必須成爲農村革命的核心，新的人民革命政權必須幫助農民「或用沒收地主田地的方法，或用減稅減租的方法來滿足自己迫切的要求」，革命軍隊則應「幫助農民反對地主分子」。（以上均見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爲了使中國無產階級在現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擔任指導者的角色，就必須「要求中國共產黨人站在農民運動的最前列」。

毛澤東同志，從一九二四——二七的大革命時代開始，就是中國共產黨全黨同志中，「站在農民運動的最前列」的模範。他在一九二五年就在湖南從事發動農民運動，爲後來北伐進軍順利通過湖南打垮吳佩孚主力準備好了羣衆基礎。一九二六年，他在廣州任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任內，又手創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這是一個與當時的黃埔軍校同樣重要的培養大革命幹部的學校。一九二七年春，他在考察了湖南的農民運動之後，到了武漢，又當選爲全國農民協會的主席，並繼續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與斯大林同志的見解相同，毛澤東同志熱烈擁護農會的權力，擁護革命人民的民主專政，擁護武裝力量 and 農民結合。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敘述成爲農村革命核心的農會權力

說：

「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停止了他們的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

毛澤東同志完全讚美無產階級領導下農民的這一切創造，因為這是中國人民爲自由而鬥爭的最高表現。

而陳獨秀却反對農會的革命權力，反對農民的武裝自衛，反對「因權力關係與各方面（按：即與豪紳權力）的衝突」，就是等於保護不合理的地主舊權力，反對創造合理的農民新權力。陳獨秀在反革命面前，真是胆小如鼠啊！當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反革命事變之後，湖南十萬農軍包圍長沙城時，陳獨秀爲了「怕引起整個政局之糾紛」，可恥地取消了進攻長沙的計劃。這一總退却的結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凱歌！

當一九二七年五月，有人問到：「現在中國是不是需要提出農民階級立刻奪取土地的口號？湖南奪取土地的事實該怎樣估價？」時，斯大林同志斬釘斷鐵的說：

「我以爲，是需要的。實際上沒收土地的口號已經在某些地區進行。在一大批的地區裏，像湖南、湖北等地，農民們已經從下面奪取土地，建立自己的法庭、自己的懲罰、自己的自衛隊。我以爲，中國全部農民階級在最近時期中都要轉移到沒收土地這個口號方面來。中國革命的力量就在於此。」

「假使武漢（按：指當時革命的武漢政府）要勝利，假使它要建立真正的力量來既反對張作霖，又反對蔣介石，並反對帝國主義，——那末它必須用各種各樣方法來支持奪取地主

土地的農民革命。」

「以爲只要單靠一種軍事力量就能够打倒在中國的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這樣想法就太愚蠢了。沒有農民革命，沒有千百萬工農羣衆積極支持武漢的軍隊，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是打不倒的。」（以上均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

斯大林同志完全讚美兩湖農民的正義行動，他給這些農民革命以極高的估價，認爲「中國革命的力量就在於此」。而毛澤東同志對當時的農民革命也正是作了同樣的估價：

「這是四十年來乃至幾千年來未曾成就過的奇勳。……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佔七分。」

毛澤東同志在這裏堅決反對了地主階級反革命對於農民革命的污蔑，反對了陳獨秀主張限制農民鬥爭而否認農民鬥爭功績的謬言。陳獨秀限制農民鬥爭說：「當地主與貧農有衝突時，應設法使舊農會（按：指大革命以前土劣所操縱的合法機關）居調停地位」。說當時農民運動「行動過左」（見他寫的第三次中央擴大執委會決議案）。在這裏，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孟什維克主義的分別是再也明顯不過了。

必須團結城市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

無產階級爲了使革命達到勝利，除了必須鞏固地團結農民以外，還應當特別注意團結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尤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因爲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其中的青年知識分子，雖然比起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來『是比較不可靠的和動搖的』，但因他們身受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

壓迫和文化落後的痛苦，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在一定的條件下，他們在中國革命運動中，還常常起着革命潮流的號角與革命思想的傳播者的作用。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談到中國青年問題時說：

「青年問題現在在中國有頭等意義。學生青年（革命學生）、工人青年、農民青年，——這都是一種能够大踏步地推進革命的力量」。

「要知道，無論甚麼人都沒有像中國青年那樣深刻地和活生生地體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無論甚麼人沒有像他們那樣尖銳地和痛苦地感到必須和這種壓迫作鬥爭」。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北伐革命失敗後的革命低潮時期，指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和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時期一樣，仍舊是受壓迫的；「因無錢開學，使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生產落後，使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他指出：「要轉入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革命之發動與完成，乃是必經的路。」（「井崗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些罪「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同志，曾經把小資產階級也看作敵人，甚至是「最危險的敵人」，這顯然是嚴重的錯誤。

必須對民族資產階級有正確的團結政策

至於民族資產階級，斯大林同志告訴我們，他們在一定的時期和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因為「帝國主義的壓迫不僅關涉到中國的勞動大眾，而且也關涉到中國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因此，在某種條件之下，在某個時期之中，中國資產階級是會支持中國革命的。」（五）

所以，一般的說來，他們可以成爲無產階級在反帝鬥爭中的一個同盟者。斯大林同志論到一九二四——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國共合作政策的正確性時說：

「一般地說，從原則的觀點，是否容許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參加一個共同的革命民主政黨或是一個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並且和它合作呢？

某些反對派以爲這是不容許的。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說明，在某種條件之下，在某一個時期，這樣的參加是充分容許的。」（四）

當時的托洛斯基分子把俄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等看待，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主張「打倒一切和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斯大林同志指出這是完全錯誤的。（五）

在中共黨內也曾發生過類似的錯誤思想，一九二三年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時被否定的以張國燾爲代表的「左」傾關門主義的觀點，就是最早的例證。後來，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些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同志，也只看見民族資產階級的曾經叛變革命的這一面，而看不見他們仍然受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損害與排擠，他們與帝國主義和當時當權的買辦豪紳階級寡頭統治仍然有着矛盾這方面，而把他們看成是一律的「一切反革命派」，放棄了使他們中立與爭取他們的政策。而毛澤東同志却從極深刻的社會觀察和獨立思考的馬列主義理論出發，看出曾經一度叛變革命的資產階級與當時的統治階級還並不一致，他們的反帝反軍閥運動還可以成爲民主革命的「一部分」，隨着民族危機的發展，他們還可以進步，因而考慮到爭取他們中立乃至聯合他們的政策，這就使後來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形成成爲可能。